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典范

——学习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

黄 庆 璋

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一部系统地深入地论述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它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详尽而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规律，阐明了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阐明了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大为发展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明确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观点。

《新民主主义论》是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的。这时候，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掀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竭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企图为投降日本扫清道路。他们在军事上与日本侵略军相配合，进攻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则疯狂地进行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宣传，叫嚣取消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当时甚嚣尘上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又把抗战以来愁眉锁眼姿态为之一扫的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中国向何处去”已成为全国人民最关注的问题。为了粉碎蒋介石国民党掀起的反共浪潮，提高和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从根本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一系列问题，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出了完整的深刻的概括和阐述。

毛泽东同志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谱写了新篇章。列宁一九一九年曾经对东方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①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杰出的典范，他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主义统治了两千多年并长期受帝国主义宰割的国家里，完满地解决列宁提出的任务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

—

毛泽东同志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贡献，首先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正确地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只是应该帮助、支持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必须是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早在一九二六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是把无产阶级领导权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作了深刻而详尽的阐明。他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并考察了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五四运动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得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结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②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应牢牢掌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政治舞台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欧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十分重视的。他们教导无产阶级要关心、参加而不要避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要求无产阶级在当前的运动中坚持自己的独立组织，坚持自己的利益，坚持运动的未来。但是，当时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还不成熟，革命的领导权还不得不落在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还只是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助手。这种情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多少还是不可避免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在对待一九〇五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上，根据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日趋腐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惯于妥协和叛卖的本性，以及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大大发展的情况，明确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应当而且能够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把农民转变成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论断。但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被沙皇反动统治者镇压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国家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列宁的论断未能在俄国实现。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不仅对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作了深刻而详尽的阐明，而且在实践中排除干扰，坚持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下赢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继而又有步骤地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大陆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科学结论，是同正确分析和对待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问题而紧密联系的。在《新民主主义论》谈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时，毛泽东同志对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作了简要分析。他明确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由资产阶级转换为无产阶级了。紧接着就对此种转换作了深刻说明，他说：“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成长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③这就揭示了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而资产阶级不能够成为革命领导者的根本原因，因为谁个能够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根本问题是在于谁能提出并实行彻底的革命纲领，谁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五四运动前，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之所以归于失败，其原因也正是在这里。

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呢？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二六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

部分，指出买办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是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既需要革命又怀疑革命，是可以争取的同盟者。继以往所作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和政策，在这一时期已大为发展和完善了。在《新民主主义论》谈到民族资产阶级时，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指出，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争取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告诉我们：“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④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认为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革命的对象。但是，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地武装侵略中国，因而有可能和有必要对大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作出分析和区别对待了。所以，毛泽东同志这时指出，各个大资产阶级集团是以不同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当着革命锋芒指向某一帝国主义的时候，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应该利用这种矛盾，把它作为间接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谈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为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强调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在抗日战争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已投降日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尚留在抗日阵营内，但是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我们党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坚决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进行了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就不可能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同志关于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这种两面性，关于利用大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矛盾的思想，对于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极为重要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不能坚持和正确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都无不同不能有区别地对待资产阶级相联系。他们或者把革命的胜利寄托在资产阶级的头上，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或者把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看成整个资产阶级的反动，不愿意也不能正确建立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实际上严重损害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

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最主要地是同农民问题紧密联系着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实质上是土地问题。在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要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就必须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农民问题。早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前，他就已经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右倾危险，这时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我们党关于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在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

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又把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农民问题联系起来,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人民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

在旧中国,由于经济很落后,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产业工人只有两百万左右。那么,中国无产阶级能否肩负起领导者的责任呢?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除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优点之外,还具有许多特出的优点,明确肯定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

由于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和阐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同五四运动以前所发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两者在革命领导权,世界革命阵线的归属和革命发展前途上是有显著区别的。把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新旧两种范畴的民主革命,为我们党制定民主革命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更加明确的依据。

二

按照一般的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中国无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块社会基地上登上革命的政治舞台的。因此,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问题,曾经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后来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都因不能正确解决中国革命进程问题而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右倾机会主义无视无产阶级的力量,否认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可能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认为二者之间隔着一道墙,只有在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机才会到来,这种在二者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成立了他们放弃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一个依据。左倾机会主义则完全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他们或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消灭资产阶级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或主张民主革命在一省或数省胜利后就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与机会主义观点相反,毛泽东同志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实际上按照民主革命的性质提出了斗争任务和党的政策、策略,同时指出这种革命的前途和发展方向。后来,他逐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深刻论述和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以及两个革命阶段相互关系的思想,是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在一九二六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不仅根据民主革命性质指明了革命的敌人、朋友和领导力量,而且在批判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的反共谬论时,就强调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行不通的。在一九二八年《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则提出了必定要经过民主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问题。在一九三五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一方面既指出中国革命

现时阶段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另一方面又说民主革命将来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到了一九三七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篇文章中，更加明确而具体地谈到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前一篇既着重论述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又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后一篇把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生动地比喻为相互关联的上下两篇文章，对于两者关系作了比过去更为完整的论述。他说：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条件。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失掉了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了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了。在一九三九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不仅提出了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样明确的论断，而且深刻指出：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对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作了更详尽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根据“现时中国的性质”、“现时中国的国情”，再一次强调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

第二，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中国革命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谈到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时，文章着重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仍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

第三，详尽地论述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为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行动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要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政权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实现革命转变而建立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一九四九年建立的全国政权在开初即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由于建立了这样的国家政权，也就从根本上把两个革命阶段衔接起来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要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无产阶级领导的共和国所有，这种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保存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我们党在民主革命过程和建国初期，建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为有步骤地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物质条件。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要建立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成为我们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也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思想条件。

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

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社会即已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以及这个国家政权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是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了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因而我国也就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了。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解决中国革命两个革命阶段相互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教导无产阶级要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当前的运动中坚持运动的未来，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既从我国国情出发，以共产主义思想做指导，提出适合一定阶段的具体的行动纲领，推进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又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干部，申明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列宁在对待俄国一九〇五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明确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著名原理，并主张以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共和国来实现革命的转变。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列宁的原理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中国革命两个革命阶段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关系，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解决了两个革命阶段相衔接的问题，特别是把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发展成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共和国，为组织广大的革命队伍，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胜利，并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根本的条件。

三

毛泽东同志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两个革命阶段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且还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解决了其他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第一，他把明确了解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任务，看作是正确认识和指导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思想是逐形成和发展的，到了一九三九年便作了完整的概括，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⑤《新民主主义论》对概括在这一条总路线里的各方面的内容作了更充分的论述，并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具体路线。后来，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在长期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的过程中，形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垄断集团，毛泽东同志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明确地提了出来，这就形成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最后的概括。他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⑥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坚持革命领导权，坚持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发展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坚持武装斗争，夺取了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第二，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武装斗争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道路，

列宁坚持武装斗争，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夺取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反动统治者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无疑地要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但是，武装斗争能否象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夺取全国胜利呢？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照搬外国经验，主张在中心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来夺取全国政权，他们的冒险主义使革命遭受了挫折。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举行秋收起义，创建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他总结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科学地提出了这条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新道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情况后，便更加深入地论述了这条道路。《新民主主义论》驳斥了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对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的诽谤、攻击，严正指出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的抗日战争，并且借用过去教条主义者把注重农村革命根据地说是“上山主义”的讽刺话，强调抗日时期正是实行“上山主义”的时候，再一次肯定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我们党正是把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结合起来，在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才坚持了八年抗战，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革命找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胜利道路，也就有利于一系列问题的正确解决。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把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精辟地概括为“三个法宝”。他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①他认为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同时这三者又同坚持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不可分离。因为，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有利于加强工农联盟，为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这种战争主要地是在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的游击战争，只有通过长期的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才能根据革命力量的新成长和敌情的新变化，由游击战争转为正规战争；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也只有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更好地进行，经过对农民长期艰巨的工作，可以把农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提高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水平而壮大党的组织，可以培养和锻炼党领导各方面工作的干部队伍，可以象“延安整风”那样广泛深入地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第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还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对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所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新民主主义论》对这个根本原则作了明确的论述。蒋介石国民党借口我们党声明愿意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而奋斗，起劲地鼓吹“一个主义”，疯狂叫嚣取消共产主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不仅揭露了他们对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歪曲，阐明了我们党的主张同三民主义的一致和区别，而且还特别申明是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和最终奋斗目标。他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下一阶段了。……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

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⑧这表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上保持纯洁性和坚定性，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绝不能忽视了自己的纲领、政治、思想、实践等等同资产阶级的原则区别，把自己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在谈到坚持统一战线，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时，毛泽东同志又反对把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他明确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⑨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既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革命精神，又要按客观实际情况决定一定时期的斗争任务和方针，有步骤地推进革命。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坚持的这条根本原则，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右倾投降主义在当前的斗争中抛弃远大理想和目标，拿原则做交易。左倾冒险主义则不按具体的历史情况决定方针和实践，陷入空想。把远大理想和目标同现实的具体斗争割裂开来或混淆起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⑩列宁曾经称这个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斗争策略”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坚持原则性为灵活性的统一，有力纠正和防止了右的和左的两种偏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它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并没有结束真理。毛泽东同志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当着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严重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科学的态度和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精神，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它使全国人民认清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前途。在这部著作的结尾，毛泽东同志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告诉全国人民：“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⑪不到十年的时间，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战斗，驱逐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创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历史无疑地表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过去，中国人民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现在，中国人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一定能够把我国逐步建设成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

②③④⑤⑦⑧⑨⑪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668、666、666—667、642、597、679、699、702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5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